

華裔離群對中國認識的一種途徑： 以黃朝翰與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為例*

陳 昌 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兼任講師)

摘 要

新加坡的中國研究有別於其他地區的中國研究，有其特殊的建構脈絡及歷史軌跡。事實上，在整個中國知識體系建構過程中，主政者的意志及主持中國研究者形塑了整個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特色。影響所及，政府的政策乃至於學術界的研究走向均看得見東亞所的痕跡。本文從離散理論的視角深入分析長期擔任新加坡東亞所關鍵角色—黃朝翰學術所長的著述論述與東亞所研究員的學術產出，作為呈現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的一種途徑。黃朝翰來自香港，曾身處歐美知識界，其缺乏新加坡本土性的特色，正是領導者所意欲的身分策略。而東亞所挑選的研究員，在身分上也大多具備如此特性，其知識產出提供了新加坡政府與西方學界關於中國的情報。顯見華裔離群學者處在中、西之間兩邊力量的拉扯下，的確會呈現出與單純來自中方或西方學者的不同研究視角，研究者身分的差異對於中國知識的詮釋存在分殊性，這也有助於理解方興未艾的中國研究之研究者處在不同位置與身分對「中國」理解的差異。

關鍵詞：華裔離群、離散理論、黃朝翰、東亞所、身分策略

* * *

壹、前 言

新加坡自從 1965 年被迫脫離馬來亞邦聯獨立建國以來，對於自身身分的問題與策

* 本文原發表於國際關係學會與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共同舉辦之「2009 國際關係學年會：國際新情勢與兩岸新紀元—機會與挑戰」，2009 年 5 月 1 日。同時本論文亦接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與政治學系「中國學研究知識社群計畫」之補助，特致謝意。作者亦感謝匿名審稿人的意見，為本文的增修提供了許多寶貴建議；另外，石之瑜教授、辛翠玲教授、于惠如小姐亦提供給本文極大的幫助，亦表謝忱。當然，若仍有疏漏之處，文責自負。

略存在某種程度的「焦慮」，這種焦慮反映在領導人以降及社會各界的言行當中。^①新加坡的人口組成有超過四分之三是華人，涉及華人群體的多元政治是東南亞鄰邦的敏感課題，如此身處在列強環伺又是小國寡民的先天環境中，新加坡的危機感要比周圍國家強得多。^②

在周邊國家氛圍反共的前提下，新加坡研究中國從一開始就很敏感，既不能引起周遭回教國家的注意，又必須調和國內多元族群的勢力，因此，新加坡的中國研究是在一個困頓不明的研究氣氛下展開。^③

在 80 年代以前，新加坡本地的中國研究，是以「海外華人」研究為主的間接中國研究，其中一個主要面向是 50 年代的民族意識到建國。^④中國民族主義因 1949 年共產黨建國而興起，讓東南亞民族運動受到鼓舞，對於脫離殖民地、獨立建國頗具影響。當時海外華人研究的面向之一是：探究中華文化傳統，說明華人如何在多種族的環境中，界定華人族群身分，傳承族群文化；研究者同時也試圖界定馬華、新華的主體性，尤其是從海外華人的身分逐漸演進成本土身分的社會過程。此時期觸及中國的研究多是文化、歷史、族群傳統等的探討。^⑤

90 年代以後新加坡和中國有了密切交流，就在滿足國家需求的目的下，新加坡的中國學研究逐漸開展，這是由國家作為主要推動者、設計之下的知識建構。^⑥基於實用目的的考量，新加坡在南洋理工與國立大學成立了數個研究群 (cluster)，每個 cluster 各有其研究方向，分別針對中國經濟、移民、環境、食品衛生、疾病等。也有較綜合性的，如設在國立大學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並由台灣或大陸學者參加協助規畫課程。^⑦

註① 李光耀認為新加坡除華裔人口之外，還有印尼及馬來西亞兩大伊斯蘭教人口，如果過度彰顯「華人」身分，會造成他們的高度猜忌與不滿，這是有鑑於在新加坡建國前一年，曾經發生種族騷亂的歷史教訓及 1969 年馬來西亞種族衝突導致流血的大悲劇，見陳岳、陳翠華編，李光耀—新加坡奠基人（台北：克寧出版，1995 年），頁 49。

註② 新加坡建國之初的危機感來自脫離馬來亞聯邦的不確定性，以及對「華人身分」的擔憂。見陳岳、陳翠華編，李光耀—新加坡奠基人，頁 43。

註③ 1949 年中國建政後，東南亞的冷戰政治興起，東南亞各國政府公開地阻止甚至禁止與中國直接進行文化交往，因此學者往往只能夠歷史文獻的蒐集與分析，或是關於漢學方面的研究，提倡中華文明，創辦專門的研究機構，出版中文書刊，包括新加坡中國學會、新社等，對於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則是付之闕如。見黃朝翰、賴洪毅，「東南亞的當代中國研究：以新加坡為例」，*國外社會科學*（北京），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80。

註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直到建國前，新加坡的中國研究把民族主義當成是研究重點。見何培忠主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511~512。

註⑤ 何培忠主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頁 511~512。

註⑥ 新加坡和中國於 1990 年 10 月 3 日建交，彼此的政經往來互動密切，尤其是雙邊貿易日益頻繁，中星經貿合作成果顯著，新加坡是中國第七大貿易夥伴，中國則是新加坡第三大貿易夥伴。2006 年，中星兩國貿易額達 408.5 億美元，比同期增長 23.3%。見「新加坡概況」，*新華網*，2009 年 9 月 29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4/15/content_358770.htm。

註⑦ 辛翠玲、陳昌宏，「新加坡的中國研究社群—中西之間」，發表於 2008 國際關係學年會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主辦，2008 年 5 月 10 日），頁 3。

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的特殊性，起於政府在中國政策上的需求。由政府成立獨立的研究機構來進行研究，同時聘請一群具有雷同特性的研究者：生於中國、長於中國，在中國取得學士，甚至碩士學位，然後在歐美名校（主要是美國與英國）獲得社會科學相關的博士學位者。東亞所如此嚴格要求保證外來性，可見在知識論上已經預設研究者的背景會影響研究成果。這個以「東亞」為名的研究單位，實際上所進行的研究範疇就是中國，而負責協調主持研究的是來自香港的黃朝翰。在中國出生、香港完成中學與大學教育，並負笈英國取得經濟學博士黃朝翰，已經在新加坡進行中國研究長達 30 年，他的華裔離群背景為何被主政者長期仰賴主持東亞所？不具備新加坡本土性背景的他又為東亞研究所帶來如何的影響？與主政者的預期是否一致？

新加坡的中國學研究發展至今已因其參與者不斷新陳代謝，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的重心與派別，故而已然出現紛然雜陳、流派林立的分析角度，^⑧使新加坡的中國學研究並未定於一尊。此外，新加坡的中國學研究社群擁有與眾不同的特點，比如與本土的政治社會議程隔離、外來分析者的加盟、以英文進行以便能與歐美交流、政治與政策主導等等。有鑑於此，欲深入掌握新加坡中國學社群，有賴於具體介紹能反映前述特點的文本與人事。

職是之故，本研究選擇在新加坡從事中國研究長達 30 餘年的黃朝翰（John Wong）及其所服務的東亞研究所（EAI）作為研究的起點，這個擁有大量政府資源及為數不少的華裔離群研究者的研究單位，讓新加坡的中國研究呈現出何種特色？而這些研究特色是否由其背景或特定人士所造成？他們又是如何引領新加坡的中國政策輸出以及中國學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關心的是：同樣深受西方學術訓練的華裔離群研究者，他們是否會有不同於其他中國學者的研究視角？在中國出生乃至於成長的背景，是否會影響他們的書寫策略？處在中、西之間的他們又如何展現他們的中國情懷？抑或能夠公正客觀地評論當代中國？

最重要的是，黃朝翰或東亞研究所雖非完全可以稱為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的典範或代表，但其所處的位置與研究人員背景的特性，^⑨正是新加坡中國研究的重要特色，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主政者的意圖。^⑩因此，本研究將有助於呈現新加坡中國學研究與其他中國學社群不同之處，也代表了新加坡另一種中國學議程的可能途徑。

註⑧ 黃朝翰、賴洪毅，「東南亞的當代中國研究：以新加坡為例」，頁 82。

註⑨ 這裡所稱研究人員的特性指的是「外來的，不具本土性」或「中國背景，西方學術訓練」的特色。

註⑩ 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指稱新加坡的人口有如此多的華人，但身處在馬來亞的世界當中，絕對不能被視為「第三中國」，也不能讓中國認為新加坡是「親屬國」，而必須強調新加坡有別於中國的獨特性與獨立性。因此，李光耀第一次訪問中國，其代表團成員刻意安排了許多非華人背景的官員，如淡米爾族外長拉惹勒南及另一位馬來族政務次長麥馬德，且所有與中方舉行的會議都以英語進行。見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台北：世界書局，2000年），頁 672。

貳、研究背景

新加坡的中國研究並非自始即一帆風順，而是歷經三個時期的調整與開展。在 70 年代以前的建國之初，冷戰時期周邊國家反共，東南亞各國政府公開阻止，甚至完全禁止與中國直接進行文化交往。其時，在國內環境困頓的情況下，學界主要將研究焦點放在提倡華人教育、創辦中文報紙及宣揚儒家學說並且翻譯介紹中國古典學術著作。此一時期還是幾位中國研究的代表人物，包括：新加坡中國學會的陳維龍 (Tan Ee Leong)、李紹茂 (Lee Siow Mong)，新社的李廷輝 (Lee Ting Hui)，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教授崔貴強 (Chooi Kwai Keong)，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饒宗頤 (Jao Tsung-i) 等，梁俊蘭認為他們是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的創始人和奠基人。^①再者，獨立之後的新加坡民族認同意識的提高，連帶使得與中國政治、文化認同的淡化甚至斷裂，其結果導致新加坡年輕一代的中文能力下降，進而使得能夠投身中國研究的學者人數大受限制。^②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末期，新加坡進入到中國研究的開展期。中國在此時已經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同時國際地位逐漸提高，經濟發展更是令世界矚目。而在同一時間，隨著新加坡經濟的快速發展而產生的社會道德問題，政府對於西方化浪潮也愈加警惕，於是便開始加強傳統亞洲價值觀，亦即「儒家思想」的概念。1982 年在新加坡前副總理吳慶瑞的領導下成立了東亞哲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y, IEAP)。^③這個時期開始有中國出生並留學歐美的博士到新加坡進行教學與研究，^④內在與外在條件的共同配合下，新加坡的中國研究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準備時期。

90 年代時期冷戰結束後，中國逐漸在經濟面吸引新加坡。為了取得投資中國的商機，新加坡開始和中國合作，然而卻在蘇州新區新加坡工業園的投資案遭遇困難。^⑤何以已談妥且從中央到蘇州市政府等均已背書的開發案，最後仍然有各種旁枝錯節並遭遇重大的困難？原本談妥的方案，有待落實之際，卻紛紛走樣，以致新加坡政府領導深感對中國的陌生與瞭解中國的迫切性。^⑥

註① 梁俊蘭，「新加坡的中國學研究」，*國外社會科學*（北京），第 5 期（2005 年 10 月），頁 75。

註② 黃朝翰、賴洪毅，「東南亞的當代中國研究：以新加坡為例」，頁 80。

註③ 這是為新加坡學校準備一套儒家思想課程而設立的研究所，同時也成為中國以外，第一個專門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術機構。黃朝翰、賴洪毅，「東南亞的當代中國研究：以新加坡為例」，頁 81。

註④ 包括崔貴強、黃朝翰及饒宗頤等人，在此時期先後來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

註⑤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的李毅研究員認為，蘇州工業園區的初期挫敗在於：忽視周圍強有力的競爭形式，因為其附近尚有一個在 1991 年成立的「蘇州高新技術園區」，兩者性質類似，並且在價格上具有優勢，同時期在中國各地也有 53 處類似的工業園區，完全無法凸顯蘇州工業園區的整體優勢；再者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對東南亞影響甚大，連帶對中國投資受到影響，外資流入放慢，國內消費不振都是不利蘇州工業園區發展的因素。見李毅，「新加坡對華投資透視」，*廣州經貿網*，2009 年 8 月 10 日，<http://www.gzii.gov.cn/>。

註⑥ 辛翠玲，「轉型中的新加坡中國學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檢索日期 2009 年 5 月 10 日，<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1.php>。

1992年，東亞哲學研究所在政府迫切需要大量有關中國當代政治經濟研究的需求下改名為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EAPE）。其主要任務是研究1979年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尤其焦點集中在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法律改革方面的研究。^{①⑦}

從IEAP蛻變為IEAPE，承載新加坡中國意識的，由針對歷史性的文化中國，轉而針對空間性的「實體中國」，並開始試圖定位今日中國，尋找其對新加坡之意義。而後，為使所務運作順暢、利於人力招募，新加坡政府更於1997年進一步將原本僅具法人身分IEAPE，併入新加坡國大，更名為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 EAI）。^{①⑧}

東亞研究所強調的是國際化與多元化的人力，不設終身職，以便來自各地的研究人員都能隨時來訪。主事者的思維是：如此人事安排更能多方延攬各地人力到此。新加坡當地有學者的解讀如此人事安排，顯示新加坡執政者得以維持高高在上，掌控一切，避免外來人士以智囊或智庫角色長期干預決策。^{①⑨}

除了東亞研究所，新加坡也有另外兩個規模較小的中國研究單位，一個是東南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主要從事東南亞地區內部和對外問題的研究，該所同時也是新加坡政府成立最早的智庫，但其研究焦點並不完全在中國。南洋理工大學國防與戰略研究所（原為Th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IDSS，現已改名為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成立的時間為1996年7月，幾乎是和東亞所同一時期，除了從事學術研究外，同時也招收碩、博士生，並授予學位，該所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很少，有時也會邀請來自美國和中國的知名學者到所進行短期訪問研究。^{②⑩}

上述兩所雖然也是政府智庫並進行學術研究發表的研究單位，但就研究人員的規模、研究焦點聚焦中國及發表著作數量都不及東亞所，^{②⑪}因此，以東亞所做為本研究的個案會有較大的參考價值。有關新加坡中國學研究進程請見表1。

註①⑦ 黃朝翰、賴洪毅，「東南亞的當代中國研究：以新加坡為例」，頁81。

註①⑧ 根據王廣武訪談稿，吳慶瑞到香港找他擔任東亞所所長，他建議吳把東亞所併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下，既可以招募優秀學者，也可以運作順利，不用擔心募款問題。王廣武訪談稿，國立台灣大學人文及社會高等研究院（2007年9月25日）（整理中，尚未公開）。

註①⑨ 辛翠玲，「轉型中的新加坡中國學研究」，前引文。

註②⑩ 同前註。

註②⑪ 現在東亞所被認為是新加坡研究中國問題的重要力量，他們為新加坡政府制定的「中國策略」提供「中國策略數據庫」以及提供背景報告。見何培忠主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頁528-530。

表 1 新加坡中國研究進程（1970～迄今）

年代	研究重點	學術機構	代表人物	學者背景	備註
70年代之前	東南亞與中國的關係及新加坡的反共產主義	無專責機構	陳維龍、李紹茂、李廷輝、崔貴強及饒宗頤	不特定	此時期對中國政治研究敏感，研究者多前去澳洲及美國。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	無特定重點	新加坡國立大學	黃朝翰	中國出生，留學歐美博士	進入「中國研究」的預備時期。
90年代以後	全面展開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的研究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96年以前），東亞研究所（EAI，97年以後）、東南亞研究所（ISEAS）、南洋理工大學國防與戰略研究所（IDSS）	盛立軍、黎楠、王賡武、黃朝翰及鄭永年等	中國出生或海外華人，留學歐美名校博士	全力衝刺各種中國研究，主要焦點放在當代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相關研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理論建構

對於華裔離群者而言，如何找到自身身分定位的問題顯得十分重要，亦即如何看待自身與從自身視角看待世界的一種切入角度。後殖民論述當中「文化認同」的基本概念是知識分子如何「看待自己」、「界定自己」與什麼認同？怎樣看待「我」與「他者」間的關係？關鍵在於身分並非由「血統」所決定的，而是社會和文化交互作用的結果。種族、階級、性別、地理位置影響「身分」的形成，具體的歷史過程、特定的社會、文化、政治、語境也對「身分」和「認同」有著決定性的作用。^②張京媛認為：誰是我們的聽眾？我們在哪裡說話？發言的場所和講話的對象影響我們想要表達的意思。華裔離群者面對不同的讀者、對象及場域，便需要有不同的寫作策略與問題意識。他們最大的優勢在於可以快速地在不同的身分間做轉換，因此，對散居海外的華裔作家而言，其學思歷程及所受的專業養成，到之後發展的所在地，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華裔離群作家會有不同的表現與調整。

後殖民理論在文化認同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面向是「族裔散居」(diaspora)：某個種族出於外界力量或自我選擇而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情況。^③散居的族裔雖身在海外，但在所居處的社會文化結構中，他們對其他時空依然殘存著集體的記憶，在想像中創造出自己隸屬的地方和精神的歸宿，故有了如 Benedick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的概念，^④或是魯西迪 (Salman Rushdie) 所說的「想像中

註② 張京媛，*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頁15。

註③ 一般人對離開自己原生地到不同地方生存的概念為：移民。但“diaspora”譯成「離散」。

註④ Benedick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p. 15.

的祖國」(imagined homelands)，藉由移居地所產生的一些矛盾而又複雜的經驗，既屬於新家園卻又無法完全被接納特殊感覺，故而產生了時間、社群意識彼此不協同 (Syncopated) 的新思維。^⑤ John Clement Ball 論後殖民英語作家時的說法：「離散理論皆同意，離散族群的多重屬性通常對記憶中或渴望的家園的產生某種強烈社群隸屬感，而且和其他離散者聲氣互通」。^⑥ 而華裔離群者對於母國存有若干的想像，但面對新的環境與文化，往往必須隱藏這部分的親暱性。因此，他們在論述中國時，始終有著既親近又抗拒的表現。^⑦

在談到關於離散政治 (diaspora politics)，Gabriel Sheffer (2003) 認為離散者和自己家鄉 (homeland) 的關係會因為「忠誠」問題而造成雙方關係的緊張。但有時也可能因為家鄉對於離散者的操作 (manipulation) 而使得離散者在遷住國 (host countries) 產生暴動的行為，甚至非法地將資源帶回家鄉。^⑧ 這在某種程度上透露了離散者和家鄉之間的關係存在著既矛盾又複雜的情愫。因為對離散者的家鄉而言，離開是某種意義的背叛，不論是自願或非自願的。但是如果一旦離散者在遷住國遭遇困境時，母國是否會伸出援手來幫忙？還是讓這樣的衝突升高到變成離散地和家鄉間的危機？Gabriel Sheffer 沒有提供答案，不過這些問題也屢屢成為離散者遷居在外的難題。

Virinder S. Kalra 認為「離散」可以不把遷徙視作僅發生一次、只產生單向性結果的事件，而是把他視為在物質與文化層面上建立鏈結與關係，並且也是一個持續行進的過程。^⑨ 華裔離群者透過不斷遷徙、跨國流動，就如同 Robin Cohen 所理解的離散概念是「涉及身體居住在某一國家，但靈魂或精神旅行該國家的時間／空間界域之外」。^⑩ 海外華人被迫放棄祖籍，現實上他們只能依附在遷住國，而感情上卻又渴望回到文化母國。James Clifford (1994) 則給予「離散」的現代概念：「指稱一般移民、難民、外籍勞工、海外社群、各種族裔。換言之，現代離散強調的是一種離鄉背井、易地而居的移動經驗 (Experience of replacement) 在原生家鄉之外另建家園的過程 (Construct homes away from home)，因此往往與跨文化接觸、邊界、流動、文化混合 (hybridity) 等概念連結」。^⑪

華裔離群學者需要藉由跨國流動來取得發言的機會，尤其是必須深入到西方。他

註⑤ Rushdie Salman, *Step across this Line: Collected Nonfiction 1992-2002*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p. 27.

註⑥ John Clement Ball, *Imagining London: Postcolonial Fi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Metropoli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4), p. 25.

註⑦ 郭佳佳、石之瑜，「鄭永年的中國民族主義敘事－華裔作家的一種身分策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3 期 (2008 年 9 月)，頁 66。

註⑧ Gabriel Sheffer, *Diaspora Politics: At Home Abroa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16.

註⑨ 陳以新譯，Virinder S. Kalra, Raminder Kaur, John Hutnyk 著，*離散與混雜* (台北：韋伯文化出版社，2008 年)。

註⑩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註⑪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9, No. 3 (September 1994), pp. 245-247.

們接受以歐美名校為首的社會科學理論教育，有許多深植書寫面的意識存在。雖然當今西方學界已經試圖解構過去自身的理論霸權，例如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的理論論述，開始反省西方現代性的普遍價值。但華裔學者身在其中，能夠抗拒「後」學的思潮，並扛起反主流大旗亦不多見。絕大部分的研究者在進行知識生產的同時，往往反映出他自身所在的位置。華裔離群需要被定位，而為了被歐美知識界接納，更必須引用西方的理論以取得論述權與詮釋權。

在 1949 年當代中國成立後，華裔離群者被迫做出選擇，政治上和母國劃清界限；當中國崛起後，華裔離群者興起了文化的共同體想像，面對東方與西方，他有了對各自的詮釋空間與權限。

職是之故，華裔離群的研究者在進行知識生產的當下，的確有必要進行問題意識的選擇與身分策略上的考量。對他們而言，必須面對的既是來自西方學術社群的挑戰，同時也可能是來自深植內心對於中國的情懷。身處在兩方力量的拉扯或引力下，研究者和知識產出間的關係顯得微妙而互動密切。本文中的黃朝翰和東亞所的華裔離群學者正具備這樣的特性。本研究分析目的即希望透過研究黃朝翰與東亞所的知識產出，來探討華裔離群者的問題意識與身分策略，藉由探討中國研究知識中，知識生產者是否會運用其多重背景進而採取不同的寫作策略，進而瞭解其背景與寫作策略上的關係，並解釋華裔離群者的多重背景對其而言，究竟是限制還是幫助。

表 2 黃朝翰各項知識產出分析表 (1973~2008/9/25)

出版項	起迄	篇(本)數	期間平均 (篇/年)	學術生涯平均 (1967~2008)
書籍 (Books)	1973~2001 (28)	9	0.32	0.21
參與編輯及專書中的部分	1976~2008 (32)	19	0.59	0.46
專題論文	1974~2005 (29)	23	0.79	0.56
未出版的政策報告	1998~2003 (5)	3	0.6	0.07
專書中的部分 (不參與編輯)	1971~2008 (37)	93	2.51	2.27
期刊	1967~2008 (41)	48	1.17	1.17
邀稿	1970~2006 (36)	46	1.28	1.12
有出版政策論文	1991~2008 (37)	69	1.86	1.68
總計	總計41年計算	310	*	7.56

說明：出版品的起迄年指的是黃朝翰第一份作品的出版年到近年有出版的作品。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在年限當中的出版品數量。

資料來源：「黃朝翰著作目錄」，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網站，檢索日期 2009 年 3 月 20 日，<http://www.nus.edu.sg/NUSinfo/EAI/>，經作者自行整理而成。

肆、從東南亞研究連結中國的黃朝翰

黃朝翰 (John Wong) 具備本研究所定義的華裔離群者：中國出生、香港完成中學與大學教育，赴英國完成博士學位，並到新加坡工作超過 30 年，同時他也有豐富的中國研究產出。以下將簡介黃朝翰的社會背景。

一、黃朝翰的社會背景

黃朝翰具備新加坡領導階層所需要的知識菁英背景，同時他又具有華人的身分，其學思背景大概可以分成中國、香港、加拿大、英國、美國和新加坡等六大區塊。

（一）中國：文化母國

黃朝翰生於中國廣東省台山縣，其小學教育在中國完成。然而卻因為國共內戰而被迫展開他的「離散命運」。因此，「中國」對黃朝翰而言，是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重要源頭，至今仍在情感上對中國有著難以割捨的關注。^②

（二）香港：中學教育及大學基礎教育

黃朝翰因為戰亂和父母遷至香港避禍，並且在香港完成了中學及大學教育，當時的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在教育上主要是學習西方的學科基礎，因此香港人的身分意識有別於其他地區的華人，黃朝翰表示「香港主要兩種人，大陸移民和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後者對中國沒興趣無法做中國研究。移民像我一樣，在香港沒有根，對中國發展反有興趣」。^③進一步根據王賡武的研究，香港人的意識形態是「殖民地人民」心態，而這種心態日積月累表現出了一種「失落感」，他認為最主要原因在於人民在政治意識上無所依歸，這種心態展現出的行為則是對政治冷漠及冷感，只關心個人，不關心社會。

黃朝翰的中學、大學，甚至回國第一份工作經驗都是在香港完成。但是當時香港學生對中國不感興趣，對共產黨也沒有興趣，新聞報導多關注在與香港相關的事務。雖然黃朝翰總計在香港待了超過 15 年以上，但除了情報與漢學之外，當時香港並不適合做當代中國研究，這種情形一直到 80 年代才有明顯的改變。

（三）英國：取得論述權

黃朝翰在英國倫敦大學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西方的科學訓練與學術語言，讓黃朝翰可以和西方有對話的基礎。事實上，黃朝翰在英國受到的是思想與智慧上的啟發，他認為英國倫敦是一個讓他「開了眼界」的地方，倫敦的國際化以及思想上的創新使黃朝翰受到極大的影響，因此倫敦可謂是他學術生涯的重要起點。換言之，如果黃沒有去倫敦，他的學術生涯可能會完全不同，在這裡接受訓練思維的方式，也正是奠定他日後學術工作的關鍵因素。^④

註② 黃朝翰時常會回到中國家鄉去，他所出生的村莊因為他的家族有六個博士，因此得到「博士村」(village of doctor)的美譽。顯然該村也以出了高學歷家族的人為榮，黃朝翰也很樂意回家鄉「光宗耀祖」，見黃朝翰訪談稿，國立台灣大學人文及社會高等研究院，2007年11月6日。

註③ 黃朝翰訪談稿，2007年11月6日。

註④ 黃朝翰表示，當時學了很多關於「假說檢定」(Hypothesis testing)，這也是他日後在自己的研究上及審稿的重要準則之一。見黃朝翰訪談稿，2007年11月6日。

(四) 美國—太座與客座教授的經驗

黃朝翰的夫人簡麗中博士畢業於美國柏克萊大學，並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他和簡博士是香港大學的同學，在 1967 年結婚後四年赴新加坡任職。黃朝翰在訪談中曾提到他受美國學術影響的主要原因來自簡麗中，他指的是美國的學術強調發表與研究，因此黃受到這部分的影響很深，也使他在學術生涯當中不斷努力寫作與出版，迄今累計各式研究報告與著作已超過三百多篇以上，詳見表 2 的統計數據。

(五) 新加坡：重要的學術基地

對黃朝翰而言，選擇新加坡作為學術事業的開展，可以讓他建立另一種新的認同，^⑤一方面有親近中國的情感傾向；另一方面又兼具提供西方時事熱點情報的學術能力。黃朝翰處於中、西之間的新加坡，透過自身的實踐與選擇，體現了多元文化所促成的能動性。

二、黃朝翰的重要文本分析

黃朝翰 (1939~) 在 27 歲獲得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因此他認為自己學術生涯的第一個特色便是非常漫長。^⑥在其長達 40 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其研究重點與論述主軸概略可以分為三個時期，茲分述如下：

(一) 青年黃朝翰：建立東南亞與中國間的連結脈絡

黃朝翰在此時期的主要著作是東盟經濟剖析：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的比較研究 (*ASEAN Economies in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本書是黃朝翰建立東南亞與中國經濟研究關係的重要開端，在該書中提到他對東盟五國經濟的興趣在於研究該地區和東亞（特別是中國）的對外經濟關係以後發生的。黃朝翰到新加坡後，選擇以東南亞經濟研究作為出發點，在書中他不忘幫新加坡辯護，認為對於使用同一標準來評估東南亞國家及新加坡的作法是有問題的，此面向也揭露了黃朝翰對於地主國的效忠之情。雖然研究的焦點放在東南亞國家，但他仍不忘讚揚中國農村的發展經驗，可作為東南亞國家農村發展的借鏡。^⑦

註⑤ 黃朝翰表示，他是在 1971 年去澳洲開會時經過新加坡時，對該國「印象深刻」，因此後來決定移民新加坡。黃朝翰訪談稿，2007 年 11 月 6 日。

註⑥ 黃朝翰訪談稿，2007 年 11 月 6 日。

註⑦ John Wong, *ASEAN Economies in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79), p. 120.

(二) 壯年黃朝翰：東南亞與中國經貿關係研究脈絡的延伸

承續著上個時期對東南亞各國的研究，黃朝翰藉由分析東南亞各國與中國的關係進而進入中國的研究脈絡。在中國與亞太地區變化中的政治經濟關係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一書中，黃朝翰解釋東盟各國和中國關係的觀點有四：第一、各國與中國各自的歷史關係；第二、各國政府的態度；第三、兩國領導人間的互動；第四、各國的盤算。因為這些各自不同的淵源與考量，東盟各國和中國的關係更顯得微妙。³⁸以印尼為例，雖然是最早承認中國的正式地位，但是蘇卡諾總統卻和中國發展「非結盟政策」(non-alignment policy)。³⁹因印尼共產黨發動政變，使得印尼政府和中國的關係決裂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 (1965~1990)，直到蘇哈託總統上台後才重新與中國重修舊好，但印尼境內始終都有反中國勢力，特別是印尼菁英分子對於中國的反動仍是持續的。⁴⁰

黃朝翰認為泰國和菲律賓的情況又和印尼不一樣。這兩個國家過去和中國關係密切，地理上也很接近，因此與中國的關係不言可喻。但新中國成立後，在冷戰期間的反共勢力 (即與美同盟的關係)，使得泰國和菲律賓也和中國劃清界限，泰國甚至堅定的支持美國的牽制政策 (containment policy)，反對任何形式的接觸，這種情況一直到 70 年代中期，泰國與中國的關係才逐漸改善。

比較特殊的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中國的關係。在 50 年代早期，馬來西亞的態度是反共的，但馬來西亞卻也是東盟國家中第一個和中國承認關係的 (1974)。馬國政府的態度上認為政治是政治，但商業可以單獨獨立出來而不受政治干預，黃朝翰認為馬來西亞的路線即是務實的實用主義展現。

和黃朝翰學術志業關係密切的新加坡，其態度和馬來西亞有些類似，由於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沒有太多的天然資源和力量與其他國家相抗衡。因此，新加坡必須和世界各國培養良好的關係，對於中國自然也不例外。⁴¹新加坡對中國的政治敏感也反映在黃朝翰的中國研究上，黃朝翰在這個時期的研究可以用「小心翼翼」來形容，從不需要太過忌諱的東南亞與中國的歷史關連脈絡，談到當代雙邊的經貿發展。尤其是東南亞境內有為數不少的華人，對於海外華人的身分究竟為何？他的解釋是，華裔在東南亞雖然稱為「中國人」(Chinese)，但那僅止於種族上、文化上及社會認知上。黃

註 38 John Wo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84), p. 246.

註 39 黃朝翰在文中用另外一個詞彙“Bandung spirit”來解釋非結盟政策。

註 40 黃朝翰認為印尼始終沒有中國發展出溫和的關係 (warm relationship)，因此連帶使得印尼的菁英分子對中國一直帶有反對或反抗意識，而最近一次的暴動是在 1998 年 5 月的暴動。見 John Wong, “Southeast Asian Ethnic Chinese Investing in China,” *Global Economic Review*, Vol. 28 (November 1999), p. 8.

註 41 新加坡是東盟國家最後一個承認中國的，黃朝翰認為這是經過高度的政治思考下所作的決定。不過黃朝翰也補充，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務實主義可以為這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帶來高度成長，因此這兩個國家對於中國在經濟上始終到持著非常正面的態度。黃朝翰訪談稿，2007 年 11 月 6 日。

朝翰認為因為所處國家的同化作用，在東南亞地區的華人已經越來越不「中國人」了。他舉例，在印尼的華人稱為“peranakan”，馬來西亞叫做“baba”，還有菲律賓的“Chinese-Filipinos”，及泰國的“Thai-Chinese”，華人在這些地區掌握的財富和他們的人數比例並不相稱。^②

黃朝翰用“Chinese diaspora”來為海外華人定位，對這些流落在母國以外的中國人而言，其實處境並不好。在東南亞國家對於華人抱持著防範的心態，許多華人的工作被限制只能從事某幾樣工作，甚至將他們視為西方殖民主義的佣人（handmaiden），許多的就業機會很難讓華人來擔任。黃朝翰在這部分的論述正符合 Gabriel Sheffer 的離散政治理論：離散者和自己家鄉與遷住國的關係，可能因為「忠誠」或有心人士的操作，而導致雙方或三方關係的緊張。

（三）近年黃朝翰：加強星中關係為發展核心的經貿脈絡

90 年代後，星中關係進入正常化，黃朝翰關於中國的知識產出也開始擺脫隱匿的態度。隨著先後主持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IEAPE）和東亞所（EAI），他積極展現新加坡對中國的企圖。^③這個時期他的研究更為聚焦在中國或中國與新加坡的關係上，不再需要透過東南亞其他國家來進入中國。2007 年他和王賡武合編了一本解讀中國發展（*Interpreting China's Development*），該書集結了東亞所重要研究員所撰寫的文章，是目前少數對於中國當代經濟進行各種角度解讀的作品。黃朝翰將全書分成四大塊：第一、中國在治理方面的挑戰；第二、經濟成長與社會結構的改變；第三、日增的社會問題；第四、中國和強權及周邊國家的關係。其實所集結的論文內容便是為中國辯解與體檢。所欲辯解的是：當西方主流認為中國即將崩潰時，他們分析中國沒有崩潰的原因；所欲體檢的是：當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其政權、社會結構及與強權國家、周邊關係的問題。黃朝翰點出中國在高經濟成長下可能的挑戰，並針對中國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提出分析及解決之道；最末則是分析新加坡和中國的特殊關係，著重面向在於兩國的商業結盟及人民間的關係。^④

近年的黃朝翰的知識產出企圖透過介紹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製造新加坡的投資發展機會。例如他在 2001 年出版的 *China's Emerging New Economy: The Internet and E-*

註② 華人在東南亞國家的比例和當地人比起來不算佔大多數，但掌握的財富卻是大部分。John Wong, “Southeast Asian Ethnic Chinese Investing in China,” p. 14.

註③ 新加坡在 90 年代後積極和大陸合作投資開發，包括蘇州工業園區及中星天津生態城等，都是高達數十億美元的投資案。「蘇州工業園區」，人民網，2009 年 9 月 29 日，<http://www1.peopledaily.com.cn/BIG5/jinji/222/7827/index.html>；「中新天津生態城」，中新天津生態城，2009 年 9 月 29 日，<http://www.eco-city.gov.cn/eco/shouye/main.html>。

註④ John Wong and Wang Gungwu, *Interpreting China's Development* (New Jersey and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2007), p. 265.

Commerce ⑤正是近年新加坡政府大力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⑥另外蘇州工業園區的評估報告則是黃朝翰生涯接受政府委託的三大計畫案之一，⑦每年對於中國當年度的經濟表現，與來年經濟成長的預測更是近年黃朝翰研究的重點，其目的就是為了確保新加坡政府對中國投資的獲利，同時加強兩國開發新的合作夥伴關係。

表 3 黃朝翰學術研究生涯（1966~迄今）

時期	職位及所在地	研究主軸	代表作	備註
青年黃朝翰 (1966~79)	拿到博士學位後先至香港大學，70年代轉至新加坡國大經濟系任教。 (香港、新加坡)	以東南亞研究為主，此時中國大陸研究蓄勢待發	中國土地改革（1973）、東盟經濟剖析（1981出版）	新加坡和周邊國家均持反共立場
壯年黃朝翰 (1980~1995)	在國大經濟系任教約10年後（90年代初期）被延攬至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IEAPE）（擔任系主任新加坡）	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中國社會主義之市場經濟、中國新經濟	中國與亞太地區變化中的政治經濟關係（1989）、瞭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3）	90年代和中國建交並開始展開密切的接觸與合作
近期黃朝翰 (1996~)	東亞所成立後繼續擔任該所領導人至今（新加坡）	星中的經濟發展關係、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政治經濟、快速反應當代中國議題研究、中國經濟發展預測	中國崛起的新經濟：利率和電子商務（2001）、中國在後江澤民時代的領導接班問題：問題與觀點（2002）、蘇州工業園區的評估研究報告	與中國簽訂多項合作計畫，包括蘇州工業園區及中新天津生態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黃朝翰的問題意識

在黃朝翰長達 40 多年的學術研究生涯中，不同時期因為在不同的研究角度與角色下，其問題意識也有存在若干差異，黃朝翰的問題意識關鍵在於從何種角度進入中國研究及以何種心態研究中國。以下將分析黃朝翰進入中國研究核心重要文本。

（一）「中國」做為工具的實用主義意識

如前所述，黃朝翰的三個重要學術時期，「中國」在他的論述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

註⑤ John Wong and Ling Nah Seok, *China's Emerging New Economy: The Internet and E-Commerc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42.

註⑥ 新加坡是世界上資訊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早發展電子商務的國家之一。根據 2009 年 4 月歐洲商學院和世界經濟論壇聯合發布的「2008-2009 年全球資訊技術報告」，新加坡在全球資訊與通信技術發展和使用程度排名中位列第四。新加坡還曾在 2004-2005 年度的這項排名中名列世界第一。「國家電子商務工作簡報」，中國國務院發展中心信息網，2009 年 9 月 29 日，<http://218.246.21.135:81/gate/big5/gjdzsw.drcnet.com.cn/docview.aspx?docid=2013189&leafid=14480&chnid=0>。

註⑦ 在黃朝翰的著作項目中有一項單獨列出的政府委託案（Unpublished Policy-Related Research Reports for Singapore Government），一共有三件，分別是：Hong Kong After Its Return to China: Shortand Medium Term Implications for Singapore（新加坡外交部委託案）；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新加坡外交部委託案）；Singapore-Suzhou Industrial Park: An Assessment（新加坡貿工部委託案），目前這三個計畫案的內容只提供給新加坡政府部長級以上的官員，並不對外公開。

貫穿各個時期的工具功能。例如在青年時期的黃朝翰，「中國」隱身在東南亞的研究中，隨著東南亞各國和中國實際外交關係的改善，中國躍然而成爲與東南亞同等地位的研究角色；近年黃朝翰則是將中國視爲新加坡重要的投資夥伴，年度的經濟評估報告即做爲新加坡投資意向書的重要參考。

因此，黃朝翰的知識產出是以「實用主義」爲出發點，對新加坡政府可能的政策動向做出建議及說明。以黃朝翰在一篇名爲「東南亞華裔人士投資在中國」的報告中，論及在東南亞地區華人對中國的投資，除了中國政策開放外，也有海外華人對母國的一種情感因素。^④除此之外，他在新加坡國大經濟系 20 年間，大量研究中國和東協間的關係。黃朝翰在 80 年代以前研究側重於區域合作與經貿發展關係；80 年代以後則將焦點放在中國逐漸崛起後，東南亞和中國的經貿如何繼續合作與發展？對東協的關係又是如何？這類的文章多達十數篇，本文茲舉其中較爲重要且論述主軸類似的文章有：“Sino-ASEAN Trade: Structure and Potentials” (1980)、^④“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sation and ASEAN” (1984)、^⑤“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into the Western Pacific Basin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ASEAN” (1984)、^⑥“The Future of ASEAN-Chinese Economic Relations” (1985)、^⑦“An Overview of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1987)、^⑧“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Asian-Pacific Economies” (1988)、^⑨“PRC 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ir Regional Impact” (1988)、^⑩“The ASEAN

註④ John Wong, “Southeast Asian Ethnic Chinese Investing in China,” pp. 8~14.

註④ John Wong, “Sino-ASEAN Trade: Structure and Potentials,” in Hong Hai and Roy Mackie eds., *Trade with China* (Singapore: Times Book International, 1980), pp. 95~97.

註⑤ John Wong,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sation and ASEAN,” in Takahiko Haseyama et al. eds., *Two Decades of Asian Development and Outlook for the 1980s*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984), pp. 21~23.

註⑥ John Wong,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into the Western Pacific Basin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ASEAN,” in T Iwasaki ed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Basin in Perspective*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984), pp. 34~36.

註⑦ John Wong, “The Future of ASEAN-Chinese Economic Relations,” presented for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Peace Asia-Pacific in the 21st Century: Searching for Coexistence and Coprosperity (Tokyo: The Professors World Peace Academy of Japan, December 12-15, 1985), pp. 2~5.

註⑧ John Wong, “An Overview of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Chia Siow Yue and Chen Bifan eds.,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Trends and Patter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Beijing and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7), pp. 48~50

註⑨ John Wong,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Asian-Pacific Economies,” in Frances F. W. Lai ed., *The Emerging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Limit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Hong Kong: Ling College, 1998), pp. 26~28.

註⑩ John Wong, “PRC 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ir Regional Impact,” in Robert A Scalapino et al. eds., *Pacific Asian Economic Policies and Regional Interdependence*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8), pp. 12~15.

Model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1988) 等，⁵⁶其中可見黃朝翰不斷透過數據來闡釋中國與東協經貿發展的前景與成果，這些研究後來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中國與東南亞的發展路徑。

透過這些研究發表，黃朝翰似乎企圖告訴讀者中國在經濟強大後，與周邊的國家在進行合作後，能夠共同取得經濟發展的好處，所以若僅就東協國家間的合作仍是不足的。因此，在 90 年代東南亞全面對中國解禁後，中國開始和東南亞恢復密切的往來關係，並在此區域扮演重要的經濟領導者角色，依照黃朝翰的解讀，東南亞各國因應中國崛起最好的方式，就是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脈絡，並且積極發展雙邊，乃至於多邊的夥伴關係。

黃朝翰為成立後的東亞所寫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聰明的政治計算：在十五大前夕的中國經濟 (*Good Political Arithmetick: China's Economy on The Eve of The Fifteenth Party Congress*)，黃朝翰分析在即將召開十五大會議前夕，中國的經濟數字顯示經濟長率接近百分之十，而通貨膨脹率只有 1.6%，這個結果黃朝翰認為中國正朝向一個穩定的高度經濟成長和低通貨膨脹率時代，而好的經濟結果給予江澤民厚實的政治資本，更能夠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黃朝翰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能給予領導人推動改革的資本，但中國內部卻存在著矛盾與對立，當時共產黨內對於「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就曾有過相當大的爭辯。⁵⁷這篇論文作為東亞所開所第一篇文章的意義在於，分析了當時中國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以及中國內部的政治矛盾，黃朝翰看到的是中國的經濟成長給予了國家領導人改革的動力，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進入中國投資的前景是可期的。尤其是中國的經濟長期是呈現穩定且高成長的狀況。

(二) 文化母國想像的回歸意識

張錦忠 (2004) 將離散在外的華人文學作品中，對中國渴望的認同依附轉變稱為「文化回歸」(cultural return)，其所揭露的重點在於：離群者對母國文化的一種認同意識。⁵⁸黃朝翰雖然是經濟學家，但其在著作中也討論到關於華人的概念，並展現出對中國某種程度的認同意識。例如：黃朝翰認為中國在過去 20 年有著高度的經濟成長和東南亞區域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些和所謂「大中華」(Greater China) 或「中國經濟圈」(Chinese Economic Circle) 是一體兩面。狹義的大中華區指的是台灣、香港和澳門，亦即技術上是中國人的領土 (technically Chinese territories)，更廣泛的定義是海外華人 (overseas Chinese) 或在國外的中國人 (foreign Chinese)。

註 56 John Wong, "The ASEAN Model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eiji Naya et al. eds., *Lessons in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 and Latin America*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1988), p. 15.

註 57 John Wong, "Good Political Arithmetick: China's Economy on The Eve of The Fifteenth Party Congress,"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1 (September 1997), pp. 1-6.

註 58 張錦忠，「文化回歸、離散台灣與旅行跨國性：『在台馬華文學』的案例」，*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7 期 (2004 年 12 月)，頁 156-157。

黃朝翰透過學術研究來解讀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也提供自己一個回歸中國的理由與管道，一次次的研究中國便是一次次的「回歸中國」，他的作品中似乎企圖要告訴讀者海外華人，在失去母國的保護下仍然能夠很堅強的生存下去，這種試圖要和中國劃清界限，但卻又不斷論及海外華人與中國關係密切的論述，在黃朝翰的作品中不時的出現。這樣的問題意識也反映了黃朝翰在身分策略上的選擇。

四、黃朝翰的身分策略

(一) 游移中、西之間的身分能動性

黃朝翰的知識產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透過西方社會科學主流刊物出版或投稿到西方著名期刊中來介紹中國。黃朝翰具有西方主流所能接受的訓練背景及身分，同時也具備詮釋的能力與權力。因此，其產出能夠被西方所注意並且參考。^⑤他學術生涯主要的著作多以英文的形式出現，有部分是先以英文寫成，再翻譯成中文或其他語言，如日文、馬來文及西班牙文。例如在 1979 年出版的《東盟經濟剖析：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的比較研究》(ASEAN Economies in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⑥這本書不僅透過紐約的倫敦書局出版，同時也在中國的廣州大學以東南亞叢書系列出版。該書不僅分析了東南亞與中國的歷史淵源，也對中國當時的狀況作了辯解。另外，黃朝翰也向中國大陸的重要期刊投稿，例如名列中國大陸人文社會核心期刊(CSSCI)的《國外社會科學及東南亞研究》等，內容多以介紹新加坡的中國研究實力與中國的東南亞研究現況等，若是以「東南亞的當代中國研究：以新加坡為例」和「中國東南亞研究面臨的學術挑戰」做對比，可以發現黃朝翰以一種看似中立且超然於中國之外的角色，來凸顯新加坡當代中國研究的客觀性與優異性，反觀中國研究當代東南亞卻是落後與不足並充滿挑戰的，黃朝翰面對中國與西方明顯採取兩種不同視角，一方面揭露自身的條件優越，另一方面又似乎善意提醒中國學術研究上可能面臨的挑戰。就此角度以觀，黃朝翰一則以進步的西方(身在中國之外)來看中國；同時又以身在中國的角色檢視中國研究的現況。

(二) 期待與中國共榮發展的策略：中國情懷的展現

黃朝翰在研究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發展時，相較於某些西方華裔學者批評中國

註⑤ 在其個人著作項下中的“Referee articles”一共有 48 篇的研究產出，其中有超過半數都是投稿到西方主流的期刊上，包括：英國的 *China Quarterly*, *Global Economic Review* 及美國的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等。

註⑥ John Wong, *ASEAN Economies in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 p. 120.

經濟發展存在的風險與假象，^①黃對中國的發展顯得寄予厚望與充滿期待之情。例如他在「從東南亞看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引用馬來西亞領導人的話：「一個繁榮的中國可以成為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一個動亂與貧困的中國可能是本地區不穩定的根源」。黃更結論道「中國經濟起飛產生了與東南亞各國良好的互動關係」，他呼籲「中國西南各省要把握這個有利的形勢和機會……相信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一樣實現經濟騰飛」。^②黃朝翰展現出十足希望中國強盛的企圖心，同時也希望新加坡能夠搭著中國的順風車而獲得利益。

五、華裔離群學者的比較：黃朝翰、鄭永年與趙穗生

同樣身為華裔離群學者的黃朝翰、鄭永年與趙穗生，其書寫的視角與策略是否會因為所處的位置與身分背景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郭佳佳（2008）曾撰寫關於華裔學者趙穗生、鄭永年面對中國的問題意識與身分策略，該研究成為本文的比較基礎。^③

（一）在問題意識上

黃朝翰將「中國」視為一種工具，作為進入西方霸權論述的一種研究途徑；鄭永年則是企圖用中國來推翻過去長期以來以歐美為中心的中國知識，辯駁西方對中國存在的偏見；趙穗生則是顯得保守許多，中國對他而言只是一個研究的對象，他無意對西方的中國民族主義研究進行批評，僅指出目前關於此方面研究的爭議之處，甚至趙將自己完全隱身於文字之後，以強調完全超然客觀的研究者身分。因此就此三人比較而言，可以看出黃、鄭及趙在身分背景及所處的位置不同而產生極大的差異。

（二）在身分策略上

黃朝翰在身分策略上是採取可「中」可「西」的身分游移性策略；一方面中國出身的背景，在中國快速崛起後，讓他採取向中國求發展的新加坡式策略，但西方的科學訓練又讓他每每以「進步的歐美」檢視「發展中的中國」。對黃朝翰而言，其身分是可以在東、西保持能動性的；鄭永年採取的身分策略則不同於黃朝翰，他的中國高等教育背景讓他對中國的發展有著高度的期待，因此，鄭永年利用他在國際學術上的能見度為中國辯解與發聲，例如他在香港的信報財經新聞的專欄寫作與新加坡聯合早報撰寫評論皆是以一種積極的中國民族主義策略來書寫中國；趙穗生身處西方，周遭多

註① 例如美籍華裔學者章家敦（2002）曾經以《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書來預測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即將敗亡，且中國繁榮經濟的背後其實存在了諸多矛盾與假象。見章家敦、侯思嘉、閻紀宇，《中國即將崩潰》（台北縣三重市：大和書報總經銷，2002年）。

註② 黃朝翰，「從東南亞看中國的經濟發展」，貴州社會科學（貴州），總第138期（1995年6月），頁8。

註③ 郭佳佳，《離散者的中國民族主義－華裔學者趙穗生、鄭永年面對中國的身分策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8年）。

為西方學者，故而他只能間接為中國民族主義發言，並且在研究策略上必須採取一種務實的民族主義態度，郭佳佳將其解釋為一種「工具性的利用」，但卻不包含任何貶謫的批判，也避免了中國學者常有的「筆鋒常帶感情」的特色，這個策略也讓趙在西方學術圈贏得一定程度的信任。三人的比較詳見表 4 的整理。

表 4 黃朝翰、鄭永年與趙穗生的問題意識與身分策略比較

	黃朝翰	鄭永年	趙穗生
身分背景	中、港、英、新	中、美、英、新	中、美
所在位置	新加坡	新加坡	美國
問題意識	「中國」做為工具的實用主義意識	建立中國中心的中國知識	為中國補充民族主義不足的文獻分析
身分策略	游移中、西之間的身分能動性	為中國發聲的民族主義策略	以西方理論書寫中國的中立策略

資料來源：郭佳佳，前引書，與作者自行整理。

伍、東亞研究所的中國研究：華人性的問題意識與身分策略的能動性

東亞研究所的前身是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ics, IEAPE)，而其再前身則是由新加坡前副總理吳慶瑞博士在 1983 年為研究儒家思想所設立的東亞哲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IEAP)。不同於 IEAPE 與 IEAP 的獨立單位特性，東亞所在王賡武的建議下被納入新加坡國立大學，身分上成為除了延續政府的智庫外，更是身兼重要的學術研究單位。^④

一、東亞所研究人員分析

東亞所的研究員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正式研究人員 (Regular Researchers)，他們的任期從兩年一聘到三年一聘不等；另一種則是訪問研究學者 (Visiting Researchers)，他們的任期短則兩個月，長則半年、八個月或一年，短期研究員的流動速度較快，每年均有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到東亞所擔任訪問研究人員。^⑤

(一) 長期研究員 (Regular Researc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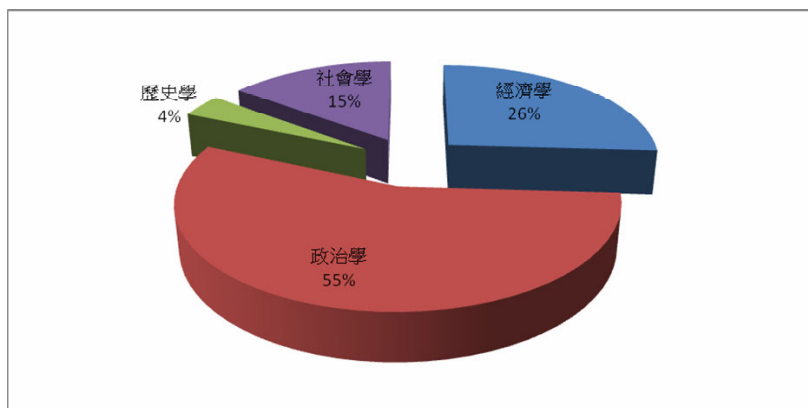
東亞所的正式研究員，目前共有 22 位 (截至 2010/01/28 為止)，主要的研究領域集中在政治與經濟兩大領域，值得注意的是正式研究員幾乎都是來自歐美名校畢業

註④ 參見「王賡武訪談稿」，馬來西亞著名評論家謝詩堅的飛揚網絡，2009 年 9 月 25 日，<http://seekiancheah.blogspot.com/>。

註⑤ 在東亞所正式的學者不多，不過因為有大量的訪問研究員到東亞所而獲得人力上的補償，黃朝翰認為這些訪問研究員的領域很廣，並且豐富了新加坡中國研究。黃朝翰、賴洪毅，「東南亞的當代中國研究：以新加坡為例」，頁 86。

(佔了 68%)，而中國畢業的博士有 5 位 (佔了 22.7%)，新加坡本土碩士和日本博士各 1 位 (各佔 4.5%)。顯見東亞所在人力安排上的考量。而研究員的研究領域以政治學和經濟學為大宗，佔了近八成，其他則僅佔兩成三。由此可知，政治學與經濟學門仍是東亞所的重心所在。關於目前研究員的專長比例，請見圖 1。詳細內容請參見附表 1。

圖 1 長期研究員研究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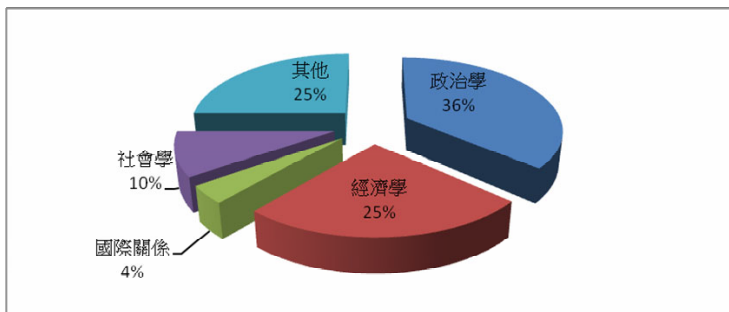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統計繪製而成。

(二) 歷年訪問研究員

東亞所的短期訪問研究員佔了東亞所人事的比重極大，為了能夠讓資訊流通與交換，目前造訪過東亞所的研究員有 184 位。而其主要專長領域集中在政治與經濟兩大領域，比例上超過六成，顯見東亞所對於訪問研究員的專長領域偏好在政治與經濟兩大領域，和長期研究員的偏好相同，只是比重略降。如圖 2。詳細統計請參閱附表 2。

圖 2 歷年短期訪問研究員研究領域



說明：研究領域是以該研究員所獲得的最高學位統計，其他領域包括：財務金融研究、企業管理、歷史學等非社會科學類的領域。

資料來源：「新加坡東亞研究所前任研究員 (former staff)」，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網站，檢索日期 2009 年 9 月 29 日，http://www.eai.nus.edu.sg/Former_Staff.htm。

二、東亞所出版品分析

東亞所的出版品種類可以分爲八類，以研究單位而言，其出版品的種類、速度與量而言都算相當多及快。歷年出版品研究項目及比重請見圖 3。

東亞所自 1997 年成立以來，發行量最大並且一直持續發行的刊物便是東亞研究所背景報告 (*EAI Background Briefs*)。^⑥其在東亞所所有名列的刊物排名第一，特色在於可快速反應當代中國及全球的議題研究。如果進一步細究至今年爲止四百餘篇的研究內容，可以分爲以下幾個主題概念：

第一、中國內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和中國境內息息相關的議題。這其中又可以根據不同的研究議題再分爲 11 小項，分別爲：經濟、政治、西藏與新疆問題、宗教、媒體與網路、教育與文化、社會福利、港澳問題、軍事分析等。^⑦

第二、中國外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國和世界的連結。包括中國與世界組織或特定國家之間的關係或經貿往來研究或各種可能的衝突等。以同於上述的分類方式可以再分爲 10 小項，分別爲：中國與世界、中國與美國、中國與歐盟、中國與拉美、中國與俄國、中國與印度、中國與東南亞、中國與越南、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亞洲等。

第三、兩岸關係。這部分可以獨立成爲一個研究課題。主要是新加坡對於兩岸間的議題一直都投以高度關注。^⑧

第四、台灣內部觀察。每年都有許多來自台灣的研究人員會固定到東亞所進行訪問及研究。^⑨他們會帶來台灣最新的研究議題，例如在總統大選期間便分析兩邊陣營的情勢。到了選後便又開始分析當選者可能面臨的挑戰等。不同於前述的兩岸關係，這部分是著眼於國內的內環境議題，是一個自己人站在外圍的角度再回頭看自身所處環境的研究。

第五、東亞研究。這部分獨立出來成爲一個主題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南北韓和中國的關係十分密切，因此，東亞所特別在這三個國家著墨不少。尤其近年北韓頻頻在國際上製造問題，因此也成爲東亞所研究東北亞重要的議題。比較特別的是這部分的研究不是談和中國的關係，而是從該研究國內部視角所進行的一種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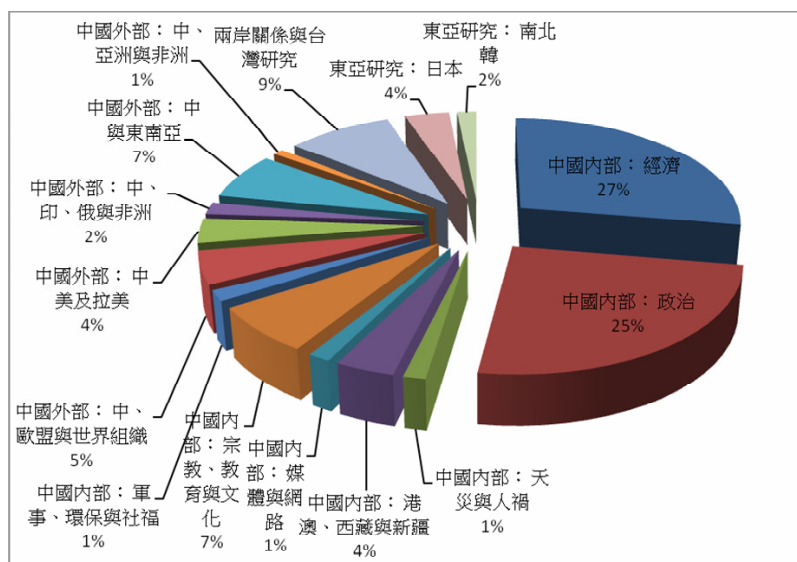
註⑥ 其讀者爲政府部長和其他高級官員，內容通常以中國國內政策、經濟、社會和對外關係有關的當代問題爲主，第 1 期於 1997 年 9 月出版。見黃朝翰、賴洪毅，「東南亞的當代中國研究：以新加坡爲例」，頁 83。

註⑦ 分類的原則主要是根據其文章標題來判定，東亞所的研究基本上便會在主題上清楚開宗明義的意思表達，如果在判定內容上有困難，再進入文本來進行分析。

註⑧ 兩岸之間第一次重要的「辜汪會談」（大陸稱「汪辜會談」）便是在新加坡的奔走之下順利在新加坡召開會議的。見「何妨換個角度看李光耀」，中國評論新聞網，2009 年 12 月 24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2/5/1/101125160.html?coluid=126&kindid=3973&docid=101125160&mdate=1104203321>。

註⑨ 國內知名政治學者如顧長永、趙建民、吳瑞國及謝復生等教授常會利用暑假或短期時間到東亞所進行研究。

圖 3 1997~2009 東亞所出版刊物研究主題比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統計繪製。

三、東亞所的問題意識

(一) 為西方提供中國情報的代言意識

東亞所研究員的著作經常登在歐美的著名期刊上，以該所三位重要的學者：王賡武、黃朝翰及鄭永年，他們的作品不僅只有在 EAI 出版，甚至極為重要的論述也在歐美的重要期刊上刊登發表。以黃朝翰為例，他在許多期刊上為中國發言，累計在其學術生涯中有 48 篇的國外期刊發表，其中多數是解釋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⑩鄭永年曾經在 2005 年接下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所長一職，他認為此舉是在幫助英國人「瞭解中國」。^⑪同樣地，東亞所的研究員在歐美期刊上發表關於對中國的研究，不啻是向知識霸權宣告自身對於中國分析的掌握，用西方聽得懂的語言及信賴的知識體系進行客觀中立的分析報告，在某種程度上便是向西方國家代言中國。

(二) 向中國求發展的攀附意識

中國崛起後對於亞洲，乃至於新加坡的經濟都產生莫大的影響，加入研究中國的行列，甚至因為研究中國而可以為新加坡帶來正確的投資與政策安排，這是東亞所存

註⑩ 「現職職員 (current staff) / 學術主任 (Research Director)」，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網站，2010 年 2 月 5 日，http://www.eai.nus.edu.sg/Current_Staff_ResearchDirector.htm。

註⑪ 鄭永年，「鄭永年：為了生我的那片土地」，餘姚日報，2007 年 1 月 8 日，<http://www.nbql.gov.cn/ShowNews.Asp?id=776&pid=000100060001>。

在的一個重要功能與目的。從 1997 年到 2000 年，東亞所對中國政經的分析報告主要可以分成三大方面：首先是對中國政府的經濟策略分析，例如黃朝翰在 1998 年所寫的「詮釋朱鎔基的中國經濟策略」“Interpreting Zhu Rongji’s Strategies For The Chinese Economy”；^⑦其次則是對中國的經濟環境與投資前景的分析，例如黃朝翰和王志廣（Wong Chee Kong）合寫關於中國的石油政策發展“China’s New Oil Development Strategy Taking Shape”^⑧或者是和投資成本有關的中國勞工政策問題“Labour In China: Policy and Legislative”^⑨以及每年年終由黃朝翰親自執筆的「中國經濟展望」，主要是分析隔年的中國經濟發展區域，並進行預測解讀。第三部分則是關心中國的政治改革與發展，這部分主要是由鄭永年來負責執筆，在 1997 年時，鄭永年便寫了一篇「1997 中國的政治」“China’s Politics in 1997”主要是在分析中國當前的政治制度與改革方向。和黃朝翰的中國經濟展望相對應的是每年年終或隔年年初出版的中國政治展望分析報告，大部分都是由鄭永年來負責執筆。^⑩

東亞所掌握了這三大部分，便能夠提供政府對中國應有的政策或投資建議，尤其是進入 21 世紀後，東亞所對中國的關注轉向至高科技產業，如網路、電子商務等，這些也都顯示了後來新加坡中間投資比重逐漸往此部分增加。

關於新加坡在中國投資區位的選擇，90 年代開始對中國大量投資時，主要投資的地區集中在廣東和福建兩省，以 1993 年為例，星商投資比重最高是福建省，佔總投資金額的 30%，其次是廣東省，佔 16%。^⑪東南亞的許多華人，包括黃朝翰在內，都是以來自廣東和福建的人居多數，與這些省分的血緣、文化關係促使他們將華南地區當作是投資的首選。另一方面，中國在開放初期也是選定廣東和福建兩省的沿海城市做為經濟特區，在兩個條件的相互配合之下，廣東和福建成為 90 年代新加坡對中國投資比重最高的地區。進入 21 世紀後，新加坡對中國投資區位有了變化，以 2004 年為例，新加坡對中國的投資區位佔最高比例的是江蘇和上海，佔了 45%，其次是廣東（14%）、山東（11%）、福建（9%）、浙江（8%）及其他地區（13%）等（詳見圖 4）。若是回溯 2001~2003 年間的東亞所研究報告，包括 2001 年的“Shanghai Rising: Emergence of China’s New Work”，^⑫2002 年的“How is Shanghai Coping with the Ageing

註⑦ John Wong, “Interpreting Zhu Rongji’s Strategies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 143 (March 1998), p. 15.

註⑧ John Wong and Chee Kong Wong, “China’s New Oil Development Strategy Taking Shape,” *EAI Background Brief*, No. 13 (April 1998), p. 33.

註⑨ Vai Io Lo, “Labour In China: Policy And Legislation,”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31 (April 1999), pp.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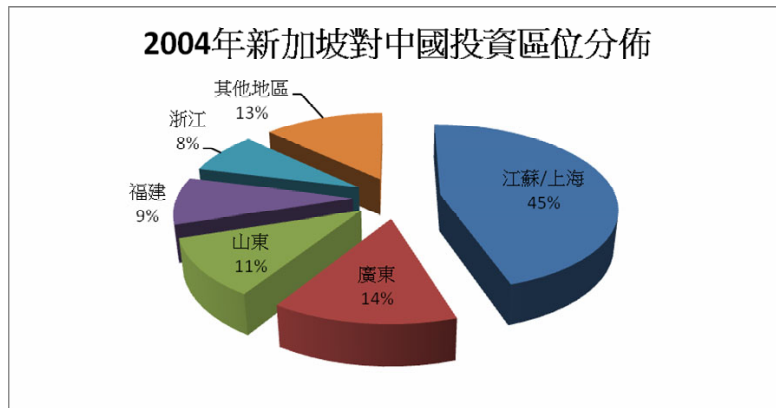
註⑩ Yongnian Zheng, “China’s Politics In 1997,”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 5 (December 1997), pp. 1~5.

註⑪ D. Lu and G. Zhu, “Singapor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Features and Implications,”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2, No. 10 (October 1995), p. 12.

註⑫ Hanchao Lu, “Shanghai Rising: Emergence Of China’s New York?”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 91 (June 2001), pp. 7~15.

Problem”,⁷⁸ “Hong Kong’s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the Pearl River Delta”,⁷⁹ 2003 年的 “Xi Qi Dong Shu: China’s West-East Gas Pipeline Mega-project”,⁸⁰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Problems Ahead”⁸¹與“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the First Two Years”⁸², “CEPA to Deepen Hong Kong’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⁸³等超過 10 篇以上的研究報告，在介紹及分析中國的投資區位，同時可以發現有許多內容都和這些地區有關，雖然不能夠直接將兩者結果劃上等號，但東亞所的這些相關研究正說明了當代中國投資熱點與趨勢，也顯示中國對新加坡而言是一個可以追求國家發展的重點投資所在，身為一個先天條件受限的國家，新加坡更懂得利用趨勢與資源，能夠利用華裔離群的身分攀附中國，達到發展的目的是新加坡所欲求的。

圖 4 2004 年新加坡對中國投資區位分佈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0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年）。

四、東亞所的身分策略

（一）從「中國」出發的身分策略

華裔離群的本源是「中國」，不論他是否在中國出生或只是華人血統。從中國出發

註⁷⁸ Peng Xizhe, “How Is Shanghai Coping With The Ageing Problem,”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 115 (February 2002), pp.1~12.

註⁷⁹ Victor Fung, “Hong Kong’s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The Pearl River Delta,”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 129 (August 2002), pp. 1~15.

註⁸⁰ Elspeth Thomson, “Xi Qi Dong Shu: China’s West-East Gas Pipeline Mega-Project,”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149 (March 2003), pp.1~17.

註⁸¹ Hongyi Lai,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II): Problems Ahead,”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157 (May 2003), pp. 1~6.

註⁸² Hongyi Lai,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I): Progress In The First Two Years,”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156 (May 2003), pp. 1~7.

註⁸³ John Wong and Sarah Chen, “CEPA To Deepen Hong Kong’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 175 (December 2003), pp. 1~10.

的身分是進入中國研究的起點，同時進入的障礙也最低。^④因為華人的身分而不會被懷疑對中國的企圖，同時華人的身分讓外界信服對中國的分析資料，因為不是在中國內，所以可以相信其評論分析的公正性與客觀性。因為對學術工具的掌握，所以可以在知識霸權體系生存。於是透過東亞所的發行刊物，透過舉辦及參加世界各地的學術研討會，或為中國辯護，或提供情報。

（二）悠遊東、西間的身分能動性

華裔離群者的跨國流動成為常態，因此具有身分上的能動性，能動性的來源在於血統、學術訓練及工作環境。中國的血統給予華裔離群者一個進入中國的視角，西方的學術訓練給予參與霸權論述及發言權，新加坡的工作環境給予他們介於東、西之間的條件。因此，華裔離群者在此種條件下可以恣意悠遊，具備身分能動性的華裔離群者，其背景與身分策略，可以藉由圖 5 來呈現，在 X 軸上的三個條件是指華裔離群者的背景：從原初的華人血統到必須在中國出生的華人，最右邊則為曾在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越往 X 軸的右邊則代表華裔離群者和中國的關係越深厚。Y 軸項下的三個條件則為提供西方關於中國情報、向中國求發展的意識（如新加坡政府的策略）、為中國的辯解之情，越往 Y 軸正向上則表示和中國的親近關係越深。這三項策略也分別代表華裔離群者在外發展、親身參與及站在中國角度發言的三項程度不同的策略。東亞所的出版品為西方提供中國的情報，黃朝翰的新中國經濟論為星中關係及中國做了解讀與辯護，並提供了政策上的建議，而鄭永年的新民族主義敘事則和西方辯論，為中國辯解。所以按照這些條件分析則東亞所華裔學者的知識產出，既是提供新加坡政府，也是提供西方國家瞭解當代中國；黃朝翰的新中國經濟論提供新加坡政府到中國求發展的理由，鄭永年的新民族主義策略則力抗西方對中國的誤解，並站在中國的立場為其發言。^⑤

五、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的一種途徑與軌跡

（一）新加坡中國學研究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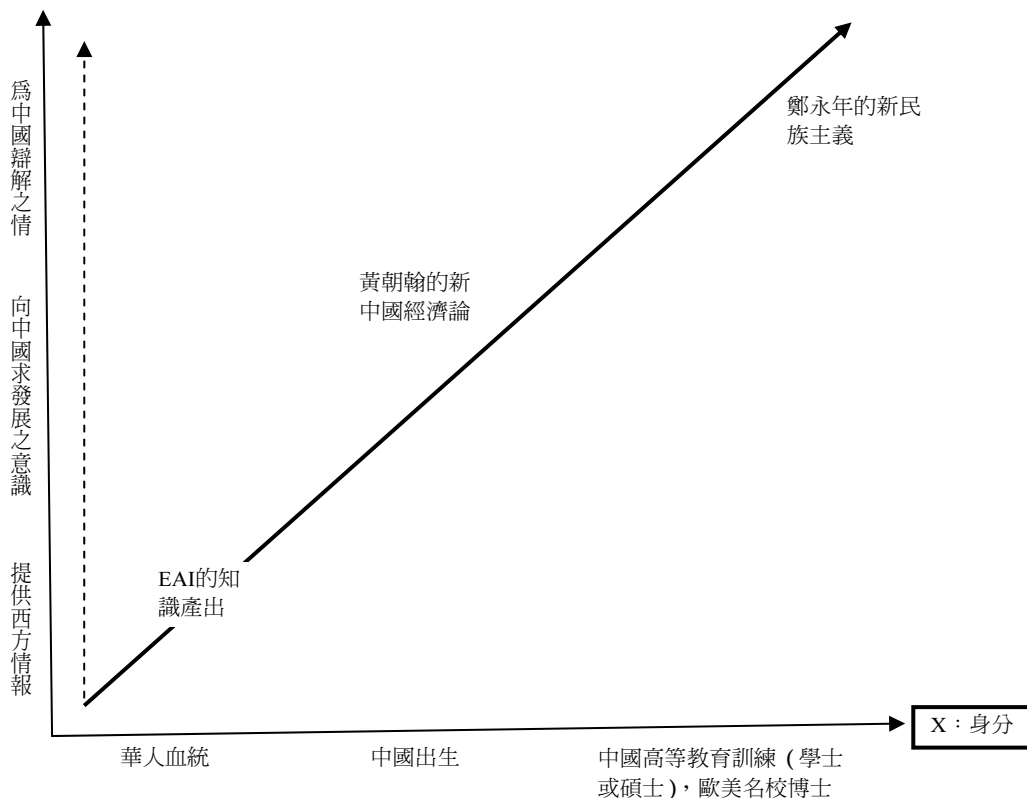
以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的研究學者為例，他們都具備離散理論中所提到的：離開自己的原居地，到了新的環境。他們是定義下的離散族群，離開自己的原鄉，但是仍具有原鄉記憶，例如黃朝翰、王賡武和鄭永年等。如前所述，新加坡社會是以華人為主要組成分子，建國時的國家氛圍無法讓他們為所欲為，反而必須小心翼翼處理和東南亞周邊國家的關係，其次才是和中國的關係。這樣的一種思維使得新加坡必須在中國

註④ 這裡的「進入障礙最低」指的是他未必需要在中国出生或在中国受過高等教育，僅具華人血統也是東亞所的最低要求，如果能夠加上中國出生、受過中國高等教育及西方名校的博士，則更為東亞所重用，鄭永年、楊大利均是一例。

註⑤ 關於鄭永年的新民族主義敘事的參考資料見郭佳佳，前引書，頁 23~30。

研究上有別於其他研究社群的處理方式。而這個研究脈絡是一條鞭式的從領導人直接貫徹命令，由上而下的中國學研究：非西方、非中國、不偏不倚的政策建議。

圖 5 華裔離群的背景與身分策略



說明：——方向與強弱性，實線為強，虛線為弱，在 X 軸上，從左到右標示著華裔離群者的背景條件，在最右邊的中國高等教育訓練背景預設了他受中國的影響為最大。僅具華人血統對華裔離群者的中國認識的影響應該是最小。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二) 工具主義的中國學研究

中國研究從建國初期的隱晦不彰到 70、80 年代的萌芽，或是在 90 年代的全面開展，新加坡的中國學研究顯得充滿漸進式思考與戰略性考量。顯而易見的，一開始新加坡在意的是如何避免自己不要成為第三中國及附和鄰國對中國的態度。因此，既無明確機構研究中國，相關學者也多赴歐美研究。到了 70、80 年代的關係緩解，黃朝翰等學者開始嘗試對中國的分析與研究，但卻缺乏有系統的機構領航及具學術脈絡的研究。

一切最大的變化要從 90 年代開始，特別是中國和印尼的外交關係恢復之後，新加坡的學術重鎮新加坡國立大學開始大規模的研究中國，這個時期對中國一年的研究成果抵得過過去數年的研究成果。東亞研究所所延攬的學者多是背景類似的學者，處在

東、西之間：中國的出生背景，西方名校的學術訓練。這樣的身分特性讓他們在中國研究中游刃有餘；既可以向西方提供看似中立的「中國情報」，同時也可以宣稱自身的中國研究最具中國特色。如此的特性造就了新加坡國大東亞研究所有別於西方國家的中國研究，亦即帶有離散情感成分的中國研究，研究者會在某種程度上透過文字書寫來抒發思鄉情懷，同時也可以從他們的研究領域中發現他們意欲研究及探索的主題，其實就是他們對家國的想像；從另一角度觀之，離開中國日久的華裔離群學者，「中國」可以是他們研究的客體，所在國家需要發展之時，當代中國可以提供他們一個發展的機會，於是當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時，華裔離群學者更能宣稱他們的分析研究，具有深入瞭解中國核心問題與新聞熱點的能力。

另外，不可否認的，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的目標讀者群是新加坡政府的高級官員，他們必需不定期地向政府官員進行專題簡報。例如黃朝翰自 1999 年起即和新加坡貿工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不定期進行關於中國經濟成長與發展的相關議題。因此，他們的工作報告（working paper）或背景報告（EAI Background Briefs）其內容通常以中國國內政策、經濟、社會和對外關係有關的當代問題為主，它的特點是：對中國的重大政治動態和主要政策提供迅速的分析與解釋。這不僅符合新加坡政府成立東亞研究所的宗旨，同時更能提供深度的政策分析與論述，讓政府部門可以對中國問題快速反應。當然，這些研究是帶有「實用目的」的成分，中國研究的知識生產者在工具理性的條件下做出知識產出，卻又不經意地流露的母國的文化情感，這樣的特殊性形成了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的一種特殊途徑與軌跡。

陸、結 論

一、華裔離群的當代課題－進出中國

新加坡作為一個海外華人的集散地，其對中國的存有若干想望無庸置疑，只是程度多寡與作法差異各有巧妙不同。然而這種想望能否毫無保留的呈現在他們的知識產出中，這就是華裔離群學者必須思考的一個面向。他們受過西方專業的學術訓練，有著比受傳統中國訓練的學者更多的學術工具，也比西方出身的學者多了對中國訊息的敏銳度，「面對中國」是個學術上的習題，同時也是情感上的難題。新加坡國大東亞研究所的黃朝翰，乃至於其中的許多學者，共同的特色為出身中國，受西方學術訓練、歐美名校博士並選擇以「中國」作為研究主軸，如同後殖民理論中的論述：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生活在所居處的社會文化結構中，但是他們對其他時空依然殘存著集體的記憶，在想像中創造出自己隸屬的地方和精神的歸宿，故而有了如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概念，「研究中國」在某種程度也代表精神上回到中國。新加坡的華人是當地的主流階層，但是新加坡政府不能夠讓組成分子因為華人為多數的原因，而使得新加坡變成了第三中國。於是從新加坡政府

乃至於研究單位，他們的政策取向，或是研究方向與立場都不能太過親近「中國」，中國只能是研究上的課題與工具，因此具體展現在東亞所的研究上，試圖以一種客觀而中立的分析角度來進入中國。

二、胸懷東方的西方研究途徑

如本文前面所述，新加坡受到東南亞周邊的國家環伺，對中國的態度會受到周邊國家如馬來西亞或印尼的影響，特別是馬來西亞在中共建政時明確地表明反共的立場，新加坡政府甫脫離馬來亞聯邦自然不可能攫其鋒地投入中國懷抱，但新加坡知道作為東南亞的國家，「中國」肯定是其謀求國家發展重要的機會。

新加坡政府、新加坡國大東亞所，乃至於黃朝翰，都是新加坡在面對中國時的重要單位。他們大多和西方能無障礙的接軌，專業的學術訓練讓他們有了把「中國」當研究客體的重要工具，面對東方時他們又具有離散理論式的情懷——一種跨界流動的關係，面對西方時卻又能不卑不亢地以學術專業來呈現研究中國的結果。於是乎他們的身分或所處的位置，變成一種策略性的運用，成為中、西兩方力量拉扯時的工具。

Gabriel Sheffer 雖然認為離散者會因為忠誠問題而和母國（homeland）造成關係上的緊張，但是新加坡的華裔離群學者的案例中其實推翻了這種說法。他們的身分反而幫助遷住國和中國的交往，甚至成為兩國間的橋樑。對中國而言，華裔離群者有著一份親切感，反而更能成為雙方合作的重要契機。

三、有利的文本詮釋位置

新加坡的華裔離群者有別於其他地區的華裔學者而言，他們有著更有利的詮釋權。身處在西方世界的學者，有時因為所處環境而必須做出某些定向的詮釋，但身處新加坡的華裔離群者，能夠巧妙地轉換來自東西方的拉扯力道，能夠順利地將其轉換成為向中國求發展的攀附意識，也能夠成為向西方闡述東方意象的代言意識。悠遊在東西方之間的華裔離群者，既帶有東方的特質，也能夠以西方的詮釋角度或研究方法與途徑以取得有利位置，這也是為何新加坡華裔離群者能夠在中國學研究取得極大成果的原因，他們的研究也屢屢受到西方學術界的重視與採用。

四、華裔離群的多重背景：限制？幫助？

對華裔離群學者的中國研究而言，多重背景的條件輔助了他們的學術能量，因為相較於單純的中國背景學者而言，他們有著西方學術的科學工具，同時也具備了詮釋的權力；中國的出身背景給予他們瞭解中國的發展脈絡，使得他們相較於純粹出身西方的中國學者，有著更容易進入中國文本的能力與途徑。因此，華裔離群者的多重背景為其塑造了研究的多重視角，當他面對不同的讀者群時可以設定不同的視角，對其中國研究而言則是重要的幫助條件。

五、新加坡中國研究與西方中國研究的差異

中國崛起後更加吸引世界各國競相研究中國，雖然西方主流國家如美國將「中國」視為一個研究課題已經超過半世紀，但對於中文資料的掌握有限以及無法親身接近中國感到十分困擾，⁸⁶對美國而言，研究中國並不是對其存有文化想像或嚮往，而是將其視為區域研究的一環。對於同樣是政策上需要的新加坡而言，中國研究給予華裔離群者親炙文化母親的機會，對母國的鄉愁可以透過研究來獲得舒解，比起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更多了身分上的能動性，這也符合新加坡東亞所在設定中國研究之初，便假定研究者的背景會影響到知識產出。

六、華裔離群的客觀中立性是否存在？

華裔學者的中國研究試圖以一種超然、客觀、中立的態度來呈現在目標讀者群面前。但經由本研究分析，這樣的客觀中立性的態度，事實上並不存在。黃朝翰的新中國經濟論不斷強調中國經濟起飛所帶給周邊乃至於世界的好處，其論述或有數據支持，但學術界對中國的悖論（例如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論）卻未曾在其書寫中窺見；鄭永年的新中國民族主義，其為中國辯護的立場已然說明了他的價值觀傾向，中立性早已不復存在；趙穗生身處西方國度裡，生存之道自是客觀分析，趙穗生選擇對中國不褒不貶，表面上迴避了自身的中國身分，但此種書寫策略，郭佳佳認為這只是反映了趙穗生在其處境下的一種生存方法，她認為趙穗生仍表現出對中國原鄉的同情情感，甚至替中國民族主義做出澄清。⁸⁷

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下，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公正而客觀地評論當代中國，華裔學者書寫策略的不同反映的是他所處的位置或其多重背景的影響，即使西方學者看中國亦或有類似的結果，黃朝翰與東亞所多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本身就已經預設了一定的立場，多重身分更會在寫作中有意識的展現。因此，華裔離群者透過這樣的跨界流動過程，讓新加坡中國學產生迥異於其他地方中國學研究，也塑造了自身研究議程的獨特性。

* * *

(收件：98年8月4日，第1次修正：98年9月24日，複審：98年10月21日，第2次修正：98年11月17日，第2次複審：98年12月18日，第3次修正：99年1月5日，接受：99年3月8日)

註⁸⁶ 何培忠主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頁58-78。

註⁸⁷ 郭佳佳，前引書，頁30。

A Diasporic Approach to China: The Case of John Wong and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Singapore

Chang-hung Chen

Adjunct Lecturer,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Education for Oversea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ina studies in Singapore is distinct; it has evolved from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Both political and academic leader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shaping China studie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EAI)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to China studies in Singapore. This has to do with its function as well as its leadership.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AI and its leadership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diasporic theory. Professor John Wong, together with colleagues he has recruited and advised, represented the Singaporean style of China studies. John Wong, originally from Hong Kong, received his training in the West. His as well as his colleagues' lack of local connection fits perfectly well into Singapore's strategic choice, that is to attend closely to China's growth, avoid ethnic sensibilities among Southeast Asian neighbors, and remain its Western outlook. The diasporic characteristics is present both in the design of the institute and the composition of its staff. By tracing the three stages in the institute's history, the paper explai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Singapore.

Keywords: Chinese diasporas; diasporic theory; John Wong; EAI; the strategy of identity

參考文獻

- 「中新天津生態城」，中新天津生態城，2009 年 9 月 29 日，<http://www.eco-city.gov.cn/eco/shouye/main.html>。
- 「王賡武訪談稿」，馬來西亞著名評論家謝詩堅的飛揚網絡，2009 年 9 月 25 日，<http://seekiancheah.blogspot.com/>。
- 「在職職員 (current staff)」，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網站，2010 年 1 月 27 日，http://www.eai.nus.edu.sg/Current_Staff_ResearchStaff.htm。
- 「何妨換個角度看李光耀」，中國評論新聞網，2009 年 12 月 24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2/5/1/101125160.html?coluid=126&kindid=3973&docid=101125160&mdate=1104203321>。
- 「到訪研究員 (former staff)」，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網站，http://www.eai.nus.edu.sg/Former_Staff.htm。
- 「國家電子商務工作簡報」，中國國務院發展中心信息網，2009 年 9 月 29 日，<http://218.246.21.135:81/gate/big5/gjdzsw.drcnet.com.cn/docview.aspx?docid=2013189&leafid=14480&chnid=0>。
- 「現職職員 (current staff) / 學術主任 (Research Director)」，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網站，2010 年 2 月 5 日，http://www.eai.nus.edu.sg/Current_Staff_ResearchDirector.htm。
- 「黃朝翰著作目錄」，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網站，檢索日期 2009 年 3 月 20 日，<http://www.nus.edu.sg/NUSinfo/EAI/>。
- 「新加坡東亞研究所前任研究員 (former staff)」，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網站，檢索日期 2009 年 9 月 29 日，http://www.eai.nus.edu.sg/Former_Staff.htm。
- 「新加坡概況」，新華網，2009 年 9 月 29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4/15/content_358770.htm。
- 「蘇州工業園區」，人民網，2009 年 9 月 29 日，<http://www1.peopledaily.com.cn/BIG5/jinji/222/7827/index.html>。
- 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 (2005)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 年)。
- 何培忠主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 (台北：世界書局，2000 年)。
- 李毅，「新加坡對華投資透視」，廣州經貿網，檢索日期 2009 年 8 月 10 日，<http://www.gzii.gov.cn/>。
- 辛翠玲，「轉型中的新加坡中國學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檢索日期 2009 年 5 月 10 日，<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1.php>。
- _____、陳昌宏，「新加坡的中國研究社群—中西之間」，發表於 2008 國際關係學年會學術研討會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主辦，2008 年 5 月 10 日)。
- 張京媛，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 (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

- 張錦忠，「文化回歸、離散台灣與旅行跨國性：『在台馬華文學』的案例」，*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7 期（2004 年 12 月），頁 156~157。
- 梁俊蘭，「新加坡的中國學研究」，*國外社會科學*（北京），第 5 期（2005 年 10 月），頁 75。
- 郭佳佳，*離散者的中國民族主義－華裔學者趙穗生、鄭永年面對中國的身分策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8 年）。
- _____、石之瑜，「鄭永年的中國民族主義敘事－華裔作家的一種身分策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66。
- 陳以新譯，Virinder S. Kalra, Raminder Kaur, John Hutnyk 著，*離散與混雜*（台北：韋伯文化出版社，2008 年）。
- 陳岳、陳翠華編，*李光耀－新加坡奠基人*（台北：克寧出版，1995 年）。
- 章家敦、侯思嘉、閻紀宇，*中國即將崩潰*（台北縣三重市：大和書報總經銷，2002 年）。
- 黃朝翰，「從東南亞看中國的經濟發展」，*貴州社會科學*（貴州），總第 138 期（1995 年 6 月），頁 8。
- _____、賴洪毅，「東南亞的當代中國研究：以新加坡為例」，*國外社會科學*（北京），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80~86。
- 鄭永年，「鄭永年：爲了生我的那片土地」，*餘姚日報*，2007 年 1 月 8 日，<http://www.nbql.gov.cn/ShowNews.Asp?id=776&pid=000100060001>。
- Anderson, Benedick,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p. 15.
- Ball, John Clement, *Imagining London: Postcolonial Fi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Metropoli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4), p. 25.
- Clifford, James,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9, No.3 (September 1994), pp. 245~247.
- Cohen, Robi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 Fung, Victor, "Hong Kong's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The Pearl River Delta,"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129 (August 2002), pp. 1~15.
- Lai, Hongyi,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I): Progress In The First Two Years,"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156 (May 2003), pp. 1~7.
- _____,"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II): Problems Ahead,"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157 (May 2003), pp. 1~6.
- Lo, Vai Io, "Labour In China: Policy And Legislation,"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 31 (April 1999), pp. 2~5.
- Lu, D. and Zhu G., "Singapor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Features and Implications,"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2, No. 10 (October 1995), p. 12.

- Lu, Hanchao, "Shanghai Rising: Emergence Of China's New York?"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 91 (June 2001), pp. 7~15.
- Salman, *Rushdie, Step across this Line: Collected Nonfiction 1992-2002*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 Sheffer, Gabriel, *Diaspora Politics: At Home Abroa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Thomson, Elspeth, "Xi Qi Dong Shu: China's West-East Gas Pipeline Mega-Project,"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149 (March 2003), pp. 1~17.
- Wong, John, "An Overview of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Chia Siow Yue and Chen Bifan eds.,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Trends and Patter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Beijing and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7), pp. 48~50.
- _____,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Asian-Pacific Economies," in Frances F. W. Lai ed., *The Emerging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Limit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Hong Kong: Ling College, 1998), pp. 26~28.
- _____, "Good Political Arithmetick: China's Economy on The Eve of The Fifteenth Party Congress,"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1 (September 1997), pp. 1~6.
- _____, "Interpreting Zhu Rongji's Strategies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143 (March 1998), pp. 10~15.
- _____, "PRC 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ir Regional Impact," in Robert A Scalapino et al. eds., *Pacific Asian Economic Policies and Regional Interdependence*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8), pp. 12~15.
- _____, "Sino-ASEAN Trade: Structure and Potentials," in Hong Hai and Roy Mackie eds., *Trade with China* (Singapore: Times Book International, 1980), pp. 95~97.
- _____, "The ASEAN Model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eiji Naya et al. eds., *Lessons in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 and Latin America*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1988), p. 15.
- _____, "The Future of ASEAN-Chinese Economic Relations," presented for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Peace Asia-Pacific in the 21st Century: Searching for Coexistence and Coprosperity (Tokyo: The Professors World Peace Academy of Japan, December 12-15, 1985), pp. 2~5.
- _____,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sation and ASEAN," in Takahiko Haseyama et al. eds., *Two Decades of Asian Development and Outlook for the 1980s*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984), pp. 21~23.
- _____,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into the Western Pacific Basin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ASEAN," in T Iwasaki e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Basin in Perspective*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984), pp. 34~36.

- _____, *ASEAN Economies in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79).
- _____,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84).
- _____, "Southeast Asian Ethnic Chinese Investing in China," *Global Economic Review*, Vol. 28 (November 1999), pp. 8~14.
- _____ and Chee Kong Wong, "China's New Oil Development Strategy Taking Shape," *EAI Background Brief*, No. 13 (April 1998), p. 33.
- _____ and Gungwu Wang, *Interpreting China's Development* (New Jersey and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2007).
- _____ and Nah Seok Ling, *China's Emerging New Economy: The Internet and E-Commerc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_____ and Sarah Chen, "CEPA To Deepen Hong Kong'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175 (December 2003), pp. 1~10.
- Xizhe, Peng, "How Is Shanghai Coping With The Ageing Problem?"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 115 (February 2002), pp. 1~12.
- Zheng, Yongnian, "China's Politics In 1997," *EAI Background Briefs*, No. 5 (December 1997), pp. 1~5.

附錄

附表 1 EAI 主要成員一覽表 (2010)

姓名	職稱	國籍	出生地	最高學歷	最高學歷所在地國家	研究領域
王賡武	主席 (Chairman)	新加坡	印尼	倫敦大學歷史學博士	英國	中國歷史、華人研究
鄭永年	所長 (Director)	新加坡	中國	普林斯頓政治學博士	美國	中國民族主義和國際關係
黃朝翰	學術所長 (Research Director)	新加坡	中國	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	英國	中國經濟發展、東亞經濟
楊大利	研究教授 (Research Professor)	中國	中國	普林斯頓政治學博士	美國	中國政治經濟與國家社會關係
薄智躍	高級研究員 (Senior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美國	中國政治與中國政治菁英
藍平兒	高級研究員 (Senior Research Fellows)	新加坡	新加坡	哥倫比亞政治學博士	美國	日中關係
潘維	高級研究員 (Senior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加州柏克萊大學政治學博士	美國	比較政治與中國政治與模式
董燕齊	高級研究員 (Senior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約翰霍普金斯政治學博士	美國	中國政治與中國發展模式
楊沐	高級研究員 (Senior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	中國	中國國營企業研究
趙洪	高級研究員 (Senior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廈門大學經濟學博士	中國	中國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與亞洲經濟共同體
陳剛	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中國外交事務大學當代國際關係博士	中國	中國政經、國際關係
黎良福	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s)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碩士	新加坡	中國媒體、中國與亞太關係
祈冬濤	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史丹佛大學社會學博士	美國	台灣研究與兩岸關係
單偉	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德州大學政治學博士	美國	政治發展、行為與態度
仝月婷	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香港	聖地牙哥大學經濟學博士	美國	中國與亞太經濟發展
王玉主	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	中國	區域理論、中國與東協關係
楊靜	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香港	牛津大學社會學博士	英國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化與新中產階級
楊麗君	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	日本	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研究
楊秀雲	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西安交通大學工業經濟學博士	中國	工業經濟與分析

余虹	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雪菲爾大學經濟學博士	英國	中國政治經濟與亞太經濟
張依缸	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Clemson 大學經濟學博士	美國	勞動與人口經濟
趙力濤	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s)	中國	中國	史丹佛大學社會學博士	美國	中國社會政策

資料來源：「在職職員 (current staff)」，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網站，2010 年 1 月 27 日，http://www.eai.nus.edu.sg/Current_Staff_ResearchStaff.htm，經作者整理而成。

附表 2 東亞所歷年訪問研究員統計一覽表

受聘職稱	人數	學位				專長領域					國籍 (出生地)			
		博士		碩士		政治學	經濟學	國際 關係	社會學	其他	中國	歐美	新加坡	其他
		中國	歐美 或其他	中國	歐美 或其他									
Visiting Scholar	18	8	0	6	4	1	4	1	0	12	15	0	0	3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77	17	58	4	1	38	19	3	7	14	65	1	0	13
Visiti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43	1	38	2	1	21	7	2	3	8	26	6	1	10
Visiting Research Officer	6	1	1	2	2	0	4	0	1	2	5	0	0	1
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3	0	3	0	0	3	0	0	0	0	1	1	0	1
Research Fellow	11	1	8	0	0	1	3	0	3	2	7	0	2	1
Research Officer	20	1	4	0	15	1	9	1	2	6	7	1	9	2
Research Assistant	2	0	0	2	0	0	0	0	0	2	2	0	0	0
Senior Research Fellow	3	0	3	0	0	1	0	0	2	0	1	1	0	1
Senior Research Officer	1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0
小計	184	29	116	16	23	67	46	7	18	46	130	10	12	32

說明：東亞所自 1997 年成立後即有訪問研究員，根據網站資料顯示，在第一年就加入東亞所短期研究行列的有駱奇 (Dr. Luo Qi)、Ms. Sim Poh Kheng、王大剛 (Dr. Wang DaGang, David)、王志廣 (Mr. Wong Chee Kong)、俞劍鴻 (Dr. Peter Yu Kien-Hong) 等。本表統計時間範圍為 (1997 年 9 月~2009 年 9 月 30 日)。

資料來源：「到訪研究員 (former staff)」，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網站，http://www.eai.nus.edu.sg/Former_Staff.htm，經作者自行整理而成。